

東亞的政治社會變動

許介鱗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本文係作者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二十九日參加由國立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一屆「亞洲展望」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

一、序

現在是轉換的時期，也是變動的時代。在國際政治方面，從軍事武力為後盾的對抗，轉變為經濟實力為基礎的競爭；在國際社會方面，由過去美蘇兩超強所統御的體系逐漸分解，出現意識形態、發展階段、依存程度、文化交流等皆有不同的多層結構。東亞在國際政治與國際社會變動當中，在這近幾十年來，以及展望二十一世紀，在全球佔樞軸的地位。東亞的經濟實力以及其多層結構，將是帶動世界繁榮的動力軸。

英法德等歐美先進國，從產業革命以來花了約二百年時間，達成現在的經濟狀態。亞洲的先進國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也花了一百多年時間，完成現在的經濟成就。然而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韓國等從前的亞洲殖民地，只花二十年左右進行經濟發展，就變成「新興工業國」了。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和韓國在一九六〇年時，工業產品在其出口總額所佔比率僅一五%左右而已，但二十年後的一九八〇年竟變成九〇%。僅二十年的光陰，就使工業產品從一五%提升到九〇%，這是產業革命以來所沒有的空前紀錄。

歐洲將於一九九二年建立單一市場，歐洲共同市場是經濟力相彷彿的十二個國家互相合作，來為「歐洲的沒落」煞車。然而歐洲與南方的非洲之間有很大的斷層，歐洲又如何來推動非洲國家的經濟開發呢？恐怕力不從心吧！同樣的北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國，在去（一九八八）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經濟合作計畫，但是美加與其南方拉丁美洲之間也有很大的隔距，又如何來領導中南美洲的發展呢？以尼加拉瓜和巴拿馬為例，恐怕束手無策吧！

歐洲的文化是以基督教「聖職貴族」為起源，有貴族志向的「儲藏文化」；美國雖然是「移民文化」，但是殘留歐洲文化的某些特質，而由WASP即白種人（White）、盎格魯·撒克遜（Anglo-Saxon）、新教徒（Protestant）為美國社

會和文化的領導者。東亞的文化源於儒家思想的薰陶，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思想，經由現代科技的發達與情報的傳遞，形成新的「流動文化」。現在東亞的基本變動是，「吾資本累積以及人之資本形成」，「吾技術開發以及人之技術發達」。在情報為核心的第三次產業革命時代，東亞在多層的資金與技術的交流之下，將成為世界新經濟秩序的領班。

二、東亞的「雁飛型」發展

按照依賴理論的說法，開發中國家（邊陲國）對工業發達國家（中心國）的依賴，壓抑了前者的經濟發展。因為邊陲國受到中心國的搾取，而且依賴關係加重了邊陲國內部的不平等。這是中心國的「外資」和外來的控制，扭曲了邊陲國的經濟結構。此結構成為資本主義對邊陲地帶的低開發化，而有拉丁美洲的經濟可資證明，因而提出一種「低開發宿命論」。^①

然而在東亞，首先是日本在戰後依賴美國，從滿目瘡痕的砲彈廢墟躍昇為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大國」；其次是臺灣和韓國的日本舊殖民地，在光復之後也能依賴「美援」與「外資」逐漸工業化，提昇為亞洲四小龍（另有新加坡、香港）了。臺灣與韓國的經濟，在「美援」以及美援停止以來，採取獎勵「外資」來投資的措施，在讓外國資本家賺錢的同時，也提高自己的經濟成長率。臺灣、韓國、新加坡、香港的亞洲四小龍，皆採「借助外資而不役於外資」的策略，其經濟發展成功的例子並不證明「依賴關係」不存在，而是說明「依賴」並不會造成「低開發」的必然結果，而給「低開發宿命論」一絲希望。^②

東亞國家在一九五〇年代東西對立的國際體系中，依附美國並獲得「美援」，並為節省外匯而採取「進口替代」工業成長政策。到了六〇年代，配合歐美中心國的勞力密集工業因利潤急速下降而有他遷傾向，即導入「外資」與「技術」，以「

註① A. G.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 Y. *Monthly Review*, 1967; Samir Amin,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N. Y. *Monthly Review*, 1976; I. Wallerstein, "The Rise and Future Demise of the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September 1974), 15(4), pp. 387-415.

註② R. E. Barrett and M. K. Whyte, "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nalysis of a Deviant Cas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March 1982), 87(5), pp. 1064-1089; Thomas B. Gold,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 Y.: M. E. Sharpe, 1986. 以臺灣的異例或奇蹟，從中心國的立場分析和證明「依賴發展論」。對此有李鴻涵的書評「穩定中成長的偏誤——評介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中國社會學刊*，臺北，民國七十六年五月，第十一期，頁二〇三～二一一。

你丟我撿的工業」(runaway industries)，進入「出口替代」工業成長期，因而普遍創下平均一〇%以上的高經濟成長率。七〇年代克服了二度石油危機，使產品順利的進出世界市場。八〇年代經濟繼續成長，但因最大市場美國的景氣衰退外貿赤字而加強進口限制，而國內工資不斷要求上漲，必須促進技術革新提昇產業結構，以因應美國「保護主義」的壓力。九〇年代就在眼前，展望着二十一世紀的來臨，東亞在新國際秩序的形成過程中又有何作爲呢？

現在，東亞有最大的龍頭日本，飛在高科技高開發的前頭，亞洲四小龍以技術革新和產業的高度化在後頭追趕，其後面又有「東協」(ASEAN)各國以新加坡爲榜樣直追，而在泰國與馬來西亞等國之後，還有中國大陸從太平洋沿岸地域或海南的「經濟特區」發展追趕。③因此，「二十一世紀是亞洲人的世紀」並不是空谷足音。

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差距，以及人口的多樣性和勤勉上進，成爲整體「雁飛型」發展的最有利條件。一國的繁榮並不需犧牲他國的利益爲代價。在日本不是有「共存共榮」的座右銘嗎？這不是「你死我活」的想法，而是在「相互依存」關係中，「相互信賴」而尋求「相互利益」的哲學。

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的日幣升值，却促使日本的資本和技術轉移到亞洲的所謂「新興工業經濟體」(NIES)，而臺幣升值等因素再使新興工業國將資本和技術轉移到亞洲的開發中國家。臺灣的資本累積和技術升級，正往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甚至中國大陸轉移，也加強了亞洲地區的協調合作關係。亞洲地區果真如雁鳥飛行，步步前進發展，成爲全球經濟的推動力。

三、日本的政治社會變動

一般的說，經濟生活的富裕化和自由化，會引起政治的民主化和社會的多元化。然而日本是一個例外，日本在戰後是在「外力」主導下，遂行全盤性的政治社會變動。

日本並不是經濟高度成長以後，才順序產生政治社會的變動。日本是在全國性的糧食饑荒，生產設備遭受戰火破壞的廢墟狀態下，依盟軍總司令部(GHQ)的指令，同時實行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和社會多元化。

在政治方面，在戰時軍國主義下一切政黨被迫解散而成立「大政翼贊會」(後改爲翼贊政治會，再改爲大日本政治會)隨日本戰敗而解體以後，在盟總的結社自由保障之下，紛紛成立了日本共產黨、社會黨、自由黨、進步黨(後改稱民主黨，

註③ 磯村尚德，「環太平洋時代的到來」，NHK特集，アジアガラの挑戰，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一九八八年，頁六一—四。

一九五五年與自由黨合併爲自由民主黨），戰後日本政黨政治的雛型於此成立。由麥克阿瑟幕僚所起草的「日本國憲法」草案，規定了國民主權、和平主義，以及基本人權的尊重，此成爲戰後日本的新價值體系的基本原則。

在經濟方面，盟總指令「財閥解體」，並爲防止財閥復活而制定「獨占禁止法」及「經濟力過度集中排除法」，但是以韓戰的「特需」爲轉機，舊財閥系列企業再行合併，並以銀行集團金融系列化。至於日本的「農地改革」，依盟總的「農民解放指令」及建議案，議會才通過「建立自耕農特別措置法」與「農地調整法修訂案」，而進行徹底的二次改革。此後，佃農變成自耕農，以佃農爭議爲中心的農民運動，也轉化爲以米價和稅金爲中心的爭利，而奠下其後經濟高度成長的基礎。

在社會方面，在盟總的有力支持下制定「勞動組合法」（即工會法），以保障勞工的團體交涉權與罷工權。其他，農民組織了「日本農民協會」，教師組織了「日本教職員組合」，經營者組織了「經濟團體連合會」，家庭主婦組織了「主婦連合會」等，世間成爲多元開放的社會。另外盟總也指令社會保障立法，使日本國民的衛生、醫療、福利、保險，多受照顧。

戰後日本在「外力」之下的政治社會變動，使從前的「天皇制國家」變成今日的「民主制國家」，使「軍國主義社會」轉變爲「和平主義社會」。但是日本人的價值觀，因拘泥於「國家主義」或「國家利益」，很難成爲亞洲人共同的理想。

第一，以日本人的「國民主權」來說，在這流動的國際社會，日本「國民主權」的優越可能蹂躪了他國的「主權」。日本曾經以「保護居留民」的名義，出兵到亞洲各國。現在日本是不出兵的，但同樣的可以用經濟力蹂躪他國的「主權」。以三井物產在菲律賓的支店長若王子信行的綁架事件爲例，日方私自付給綁匪鉅額贖金而助長了匪徒的猖獗和囂張。菲律賓政府的發言人班尼諾（Teodoro Benigno）抨擊說，日本破壞日菲兩國的外交關係，因爲日本未獲得菲律賓政府同意，即私自與美國交涉、讓釋放之後的若王子到美國的克拉克空軍基地（Clark Air Base）醫院過夜，第二天即送若王子回日本。菲律賓的警察首長維亞（Renato de Villa）也批評說，日本官方對菲律賓治安機關的調查不肯合作，也未從三井得到任何有關綁架的訊息。^④

日本的「國民主權」使菲律賓的「國格」掃地。日本憑其經濟力，將若隱若現的「國權」，延伸到亞洲各地來。國界使人與人隔絕，劃分爲二個完全不平等的人類。

第二、戰後日本的「和平主義」，也不過是爲日本免於捲入戰爭，而坐收「漁翁之利」。當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的時候，經團連會長石川一郎說這是「天佑」或「神風」，股市價格急速暴漲。^⑤美軍的「特需」，第一年度爲三億二八九二

註④ 許介麟，「日本能使菲律賓『國格』掃地？」，日本文摘，臺北，民國六十七年八月，第二卷第七期，頁八、九。

註⑤ 鈴木正四，戰後日本の史的分析，東京·青木書店，一九六九年，頁一七三。

萬美元，第二年度爲三億一五六一萬美元，第三年度爲四億九三二二萬美元，韓戰後的第四年度爲二億九六六一萬美元，第五年度爲一億八六二五萬美元，累計達一六億一八七三萬美元之多。⑥此「特需」景氣成爲日本經濟復興的轉機。

美軍在越戰所使用的超大型油脂燒夷彈 (napalm bomb)，據說九二%在日本生產。而通產省在一九六七年發表「越戰特需」的概況，說一九六六年度的特需收入爲四億七千萬美元。⑦可見日本的「和平主義」，在越戰也獲漁翁之利。

第三、以基本人權的尊重來說，日本的法律制度往往只尊重日本人的基本人權，而蔑視外國人的基本人權。以捺指紋爲例，日本人到臺灣或亞洲各國居留，除非犯罪是不押捺指紋的。然而外國人到日本居留，依日本的「外國人登錄法」(第十四條)，皆必須押捺指紋。指紋是人人迥異終身不變，可以利用於搜查犯罪，因此刑事訴訟法下的嫌犯或監獄法施行規則下的罪犯，即規定採取其指紋押捺。現在，日本人的基本人權受尊重，除非嫌犯或罪犯不必押捺指紋，而外國人皆必須押捺指紋，這等於把一切外國人視爲嫌犯或罪犯，也就是蔑視外國人的基本人權。

在居留日本的外國人羣起抗議與拒絕押捺指紋的情況之下，一九八四年八月東京地方裁判所仍判決押捺指紋並不違反憲法第十三條「尊重一切國民爲個人」的權利，並對拒絕押捺指紋者科以一萬圓的罰金。最近日本政府雖然修改外國人登錄法，規定從一九八八年六月起押捺指紋只限最初的一次，以後不必年年再押捺指紋。⑧但把外國人視如嫌犯或罪犯的基本觀念沒有改變。

總而言之，日本人的「國民主權」、「和平主義」，以及「基本人權」的價值觀，除非擴大到亞洲人甚至世界的全體人類去，成爲人類共同信守的價值觀，否則光靠優越的資本與技術，不一定能領導亞洲人共同去建立新的國際政經秩序。

日本必須克服「心理上的鎖國主義」，日本國民必須在精神層次的「國際化」而非口頭上的「國際化」，以「推己及人」的態度平等待人，才能贏得亞洲各國人民的信賴和尊敬。

四、東亞的政治社會變動

日本以外的東亞國家，例如中華民國臺灣和大韓民國，一直被歐美列強或日本譏評爲「權威主義」的國家和社會。⑨因

註⑥ 安藤良雄編，近代日本經濟史要覽(第二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三年，頁一五四。

註⑦ 日本平和委員會編，日本の黑書，東京，勞動旬報社，一九六七年，頁八七—九五。

註⑧ 朝日年鑑一九八八，東京，朝日新聞社，一九八八年，頁二二六、及二四一—二四二。

註⑨ 例如，猪口孝，國際關係的政治經濟學，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八五年，頁一五二—一七四。

爲臺灣在國民黨政權的統治下，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實施戒嚴，直到最近才解除戒嚴；韓國自一九四八年獨立以來，除了極短時期之外，皆由政變產生政權，直到一九八八年二月盧泰愚總統第一次實現和平轉移政權的先例。其他的亞洲四小龍，香港在香港政府的支配下，也未實現完全的代議制民主主義；在另一端的新加坡，從一九五九年成爲英國的自治領，一九六五年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以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壟斷了全部的政治機構。至於中國大陸與北韓等共產黨統治的地區，則更歸類爲「極權主義」的國家。

然而東亞各國，特別是亞洲四小龍經過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現在也到達政治社會胎動的時期。一般來說，人們獲得了一定的財富，就會尋求更大量的自由。就經濟發展程度與政治社會自由之間的關連性來說，在經濟落後或半落後狀態，容易傾向一元性獨裁制度，而高度工業發達的國家，大多實行多元性民主制度。隨着經濟的發展與財富的累積，政治的民主化和社會的多元化乃不可避免的傾向。

中國大陸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實行經濟改革，隨着物質生活的提高，天安門前興起大夥學生要求自由與民主的運動。西藏的暴動，從經濟的觀點來看，也可以說是經濟發展的地域差距，引起偏遠少數民族的不滿。^⑩

在東亞北邊西伯利亞佔有廣大領土的蘇聯，自一九八五年戈巴契夫總書記上臺掌權以來，以柔軟的姿勢推行「改造」(perestroika)與「開放」(glasnosti)政策。他在一九八六年的海參崴(Vladivostok)演說與一九八八年的克拉斯諾雅斯克(Krasnoyarsk)演說，宣告蘇聯也是亞太地區國家之一，蘇聯願意裁減在亞太地區的傳統軍力，對於引起南亞地區不安的高棉問題也願意設法解決，以與東南亞各國建立更友善的關係。^⑪

蘇聯因爲經濟困難，不能援助越南，越南只好在一九八九年四月五日發表，將於九月底完全撤出其駐高棉的越軍。五月的中蘇共在北平的高峯會議，對高棉問題的解決，在其「聯合公報」表明，雙方在越南撤軍，政治解決高棉問題，國際監督高棉選舉，外國減少對高棉的軍援，並支持實行高棉四派參加的民族和解，而達到一致看法。至於如何實現「和解」則未達共識，這恐怕是雙方避免給人「中蘇共聯合操縱」的印象。高棉問題如果獲得解決，對東南亞地區的穩定有極大的助益。

蘇聯的經濟困難，也促使其從蒙古撤出三個師的軍隊和全部空軍，並在中蘇邊界撤除四百多枚中短程導彈，裁減二十萬軍隊。^⑫蘇聯並未承認韓國爲國家，但在韓國設立貿易事務所，推行與不同體制的經貿交流，以所謂「新思維」作爲其外交

註⑩ 淺井基文，「東アジアの脱冷戦と日本」，世界，東京（一九八九年六月），岩波書店，第五二八號，頁一三五—一四八。

註⑪ 佐藤哲雄，「ゴルバチョフのアジア太平洋戦略」，現代の理論，東京（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現代の理論社，第三五六號，頁四〇—四九。

註⑫ 「巨人息干戈」，亞洲週刊，香港，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八日，頁一〇—一七。

政策的指導方針。

中蘇共關係的改善、朝鮮半島情勢的緩和，如果再加上高棉問題的解決，則東亞的國際政治與社會將面臨重大的改變。而且這與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世界霸權結構，到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轉變，有密切的關係。

在一九五〇年代以至一九七〇年代，國際的霸權結構是以美蘇的核子武力為中心，核武力競爭的超強支配了全世界的軍事化，軍事因素又決定了其同盟國的政治方向，而政治動向再決定各國的經濟情況。然而一九八〇年代以後，軍事第一、政治其次、經濟殿後的秩序完全倒轉過來。經濟的榮枯波及政治，而政治的勝負影響軍事。美國從戰前到戰後，一直採軍事優先的政策，因此進入八〇年代以後陷入財政和貿易雙重赤字字的困境，現在又面臨戈巴契夫裁軍的攻勢而進退兩難了。相對的日本經由「太平洋戰爭」的教訓，在吉田茂時代奠定「經濟立國」路線，從戰前的軍事為第一線而政治與經濟緊接於後，改變為戰後的經濟為大前提而政治與軍事殿其後，變成今日在世界上擁有最多資產的「富國」了。

在美國的霸權衰落的情況下，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因受到意識形態的束縛和官僚主義的僵化，經濟問題也搞不好而困難重重。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略有成就，蘇聯正從社會輿論的「開放」，發展到政治體制的「民主化」，但是對經濟改革仍一籌莫展。中國大陸推行經濟改革十年，從太平洋沿岸的「經濟特區」開放和自由化，現在面臨學生運動要求政治改革的大風暴。中蘇共的和解，表示時代的巨輪從軍事與意識形態的對立，轉換到經濟上的互相依賴與競爭了。

隨着在國際上超級強國的衰退，東亞各國經濟力的成長，各國在國內的政治統治力亦受民主力量的牽制，各種社會運動亦蓬勃的湧現出來，這就是東亞朝向政治民主化和社會多元化的大變動。

五、臺灣在東亞變動所佔的地位

中華民國所處的臺灣，在東亞佔非常獨特的地位。在滿清時代，就有許多不堪「東方的專制主義」壓迫的人們，從中國大陸逃走偷渡臺灣，尋找自由的天地。當清末中國大陸推行洋務運動失敗的時候，臺灣就很成功地由商民出資建造鐵路、開發礦業、架設電線，並在後期洋務運動時從事「臺灣建省」等新行政組織的改革。^⑭臺灣屬島嶼地理，對外交通方便，自一八六〇年開港以後，商品經濟更形發達，貿易對象由開港前之以中國大陸為主，日本和南洋為輔，擴大而包括全世界。^⑮臺

註⑭ 戴國輝，「清末臺灣の一考察」，仁井田陸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三卷『日本法とアジア』，東京，勁草書房，一九七〇年，頁三五七—二九六。
註⑮ 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晚清臺灣，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六十七年，頁一。

灣在清末，已經是全中國之中商品經濟最發達，農業生產都以島外的市場作為目標，商人資本家有相當的勢力，在商業及貿易上能夠獨立自由活動，只需要注入新的貿易機會和引進新的生產技術，即可輕而易舉的改變農耕作業而邁進工業化的經濟形態。¹⁵

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給日本以後，在日本當局的「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殖民政策下，臺灣扮演生產米糖等糧食以支援日本工業化的角色。¹⁶在「大東亞戰爭」的進行下，日本除了動員臺灣經濟力量供其作戰所需之外，還進一步將臺灣的政治和社會層面軍事化。因臺灣的地理重要性，日本以國策公司「臺灣拓殖會社」開發臺灣資源，並引進化工、石化材料、煉鋁、機械、紡織等工業，使臺灣成為日本的「南進」基地。¹⁷日本即使強制「皇民化」教育，然而臺灣民衆的思想總是比日本人更前進，更自由的思索「天皇制國家」以外的事情。

戰後臺灣復歸中國以後，因國共的內戰以及其後臺灣海峽兩岸的對立，仍然是軍事第一，政治社會的自由其次的狀態。在日據時代接受「日本教育」的戰中派，因受「懲治漢奸條例」以及「戒嚴法」的威脅，沒有登上政治舞臺的機會，紛紛轉向經商，而在經濟的領域活動。相對的在日本，政界一直由戰中派掌握政治權力，雖然最近也有戰後派的略為升起。

戰後的臺灣政治，一直由從前「國民革命」的元老派掌政，在軍事優先的戒嚴體制下，還有四十年未曾改選的國會議員。蔣中正與蔣經國二代的「強人政治」，沒有競爭性的在野黨存在，國會只有部分的增補選而沒有全面的改選，因此難免被稱為「權威主義」體制。

在權威主義政治之下，臺灣的社會相當安定。經由土地改革政策以及普及義務教育制度，人們較自由的從事經濟活動，於是在東亞除了日本之外，另創造一個經濟奇蹟，躍升進入「新興的工業化社會」(a newly industrialized society)。臺灣引進外資與技術，促使工業生產與出口貿易直線上升，同時也增加了平均的國民生產毛額(GNP)。臺灣如果與韓國相比，貧富差距較小，而稱為「均富」的社會，這是因為有廣大的中小企業羣在「打拼」外銷，並支持既存的經濟自由開放體制。在戒嚴體制下的「政經分離」政策，政治活動雖然壓抑，但經濟活動自由開放，也許是臺灣經濟發展成功的原因。

然而經濟的快速發展，奠下臺灣走向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的基礎。進入一九八〇年代以後，臺灣最大的外銷市場美

註⑤ Ramon H. Myers, "Taiwan under Ching Imperial Rule, 1684-1895: The Traditional Economy,"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2), No. 2, Vol. 5, p. 379.

註⑥ 依田憲家，戰前の日本と中國，東京，三省堂，一九七六年，頁二五三—二五五。

註⑦ 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一九七五年，頁三四六—三四九。

國，因為景氣衰退而加強貿易保護主義的色彩，加上國內工資的上升，臺灣面臨技術升級與產業結構高度化的局面。特別是一九八五年九月的美元貶值，以及其後的強迫臺幣升值，大大的影響中小企業的經營。加上「十信案」的金融恐慌，「江南案」情治機關的受打擊，久受壓抑的社會運動蓬勃起來。一九八六年九月，臺灣第一個反對黨——民主進步黨不顧禁忌正式成立，隨後執政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解除戒嚴令及不禁止新黨組成的方針。在朝野雙方不斷容忍與溝通往來的互動下，政黨政治已在臺灣萌芽成長。

由於反對黨的出現以及戒嚴令和報禁的解除，加上「政治強人」蔣經國的去世，臺灣的政治民主化的更進一步推展是可預期的。在民主政治脫離不了「金權政治」的陰影下，行政的內閣由非民選的「技術官僚」(technocrat)構成的設計，說不定可以相當的切斷政經的勾結關係。今後的政治體制，不可能往美國式的總統制或日本式的內閣制發展，必是獨創一格的「新政治」。因為「元老政治」已經衰退不再復返，戰後派的「新思維」正在醞釀創造東亞的「政治奇蹟」了。

在社會的層面，臺灣近年來也頻頻出現勞工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環保運動、消費者保護運動，甚至原住民運動、客家人運動等社會運動。其他還有各種主張權益受損的人們，採取散發的「自力救濟」方式，走上街頭向立法院或行政機關示威請願，而有「示威日常化」的現象。臺灣已是多元開放的社會，異議分子的示威也變成很平常的事。如何在國內統合多元的異議團體，而在國際上參與區域性經濟合作，成為東亞「雁飛型」發展的主力，為臺灣今後的課題。

六、結 論

政治與社會的變動，不但涉及國家(政府)與社會(民間)之間的勢力消長，同時也牽涉到整個國內體制與國際政經體系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

從民間社會來說，一方面要向國家(政府)爭取更多的自主權益，另一方面又與國際社會形成市場分工的關係，喜歡「無國界的經濟」(borderless economy)，而有「世界主義」(globalism)的傾向。從國家或政府來說，一方面要在民間社會中扮演仲裁者或統合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對外來的國際勢力也要對國民扮演保護者的角色，而成爲「公權力」的擁護者，因此有「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傾向。

展望二十一世紀的來臨，無疑的亞洲將成爲世界經濟的主導地位。在東亞，日本擁有人才、資金、技術、貿易市場，爲亞洲的龍頭。同樣的，臺灣也有人才、資金、技術、貿易市場，爲亞洲四小龍的榜首。然而在區域性經濟合作方面，東亞總是遠遜於歐洲和北美洲。

日本人雖然長久以來提倡「國際化」，但從世間的眼光看起來只是「美國化」，尙且避免不了美國「三〇一條款」的報復。我們總以為，日本人的「國家主義」色彩太濃厚，日本商人太「愛國」，太拘泥於「國家利益」的得失。如果說「世界大同」的理想不切實際，那麼我們從「對亞洲的認同」來起步吧！

所謂「國際化」的方向，在當前並不是照美國的意思「美國化」，而是主體的共同尋求「亞洲的共同體化」。因為歐洲成爲共同體，北美洲也成爲共同體，我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美國的作風，是以強國對弱國的「雙邊談判」，以各個擊破的戰術來解決經貿問題，這種「雙邊主義」(bilateralism)根本就違反自由主義經濟的精神。日本與亞洲新興工業國又有何選擇的餘地呢？

我們誠心誠意的建議，「日本國股份有限公司」應該打破「國家主義」的框架，擴大在亞洲各國之間的網脈組織，重新創立一個「亞洲股份有限公司」。這裏有更多的人才、資金、技術、貿易市場互相交流，截長補短。此大公司擁有上游、中游、下游的階段性發展的公司，互補互利，經之營之，共享繁榮。

君不見在亞洲民間，日圓的流通有逐漸取代美元之勢嗎？同樣的，從前到處碰壁的新臺幣，現在在亞洲各國的黑市大受歡迎！亞洲共同體不可止於夢想，應共同勉力致之。

*

*

*